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福利经济学

[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 著 金镛 / 译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晏智杰 / 主编

福利经济学

[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 著 金镛 / 译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利经济学 / (英) 阿瑟·塞西尔·庇古 (Arthur Cecil Pigou) 著;
金镛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4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

ISBN 978-7-5080-9076-4

I. ①福… II. ①阿… ②金… III. ①福利经济学 IV. ①F0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177 号

福利经济学

作 者 [英]阿瑟·塞西尔·庇古
译 者 金 镛
责任编辑 李雪飞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46.5
字 数 730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网址: www.hxph.com.cn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序

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如以 1882 年上海美华书馆印行《富国策》〔英国经济学家 H. 福西特（1833 ~ 1884）《政治经济学指南》（1863 年）中译本〕为开端，迄今为止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回顾这段不算很长然而曲折的历程，不难看出它同中国社会百多年来的巨大深刻的变迁密切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思想界特别是经济思想界潮流和走向的某种折射和反映。单就建国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名著的翻译出版来说，窃以为明显呈现出各有特点的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前几十年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著作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其宗旨在于提供批判的对象和资料。对于出现这种局面的不可避免发生及其长短是非，人们的看法和评价可能不尽一致，但此种局面不能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已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短短二十多年间，翻译出版数量之巨，品种之多，速度之快，影响之广，均前所未有，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这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的进步，主流无疑是好的；但也难免有选材不够精当和译文质量欠佳之嫌。

华夏出版社推出这套新的《西方经济学圣经译丛》，可谓正逢其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中国经济学队伍的建设 and 壮大，我们需要更多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经济学；而以往几十年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也正在变成宝贵的财富，使我们将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这项事业，得以在过去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们会以实践为标准，比以往更恰当地把握选材范围和对象，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将各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纳入视野；我们对译文质量会以人所共知的“信、达、

雅”相要求，尽力向读者推出上乘之译作。我们还会认真听取广大读者和学者的任何批评和建议，在分批推出过程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

在西方经济学迄今的发展中，涌现了数量不少的重要著作，其中亚当·斯密《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初版于1890年）和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是公认的三部划时代著作。《国富论》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学原理》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为经济自由主义做了总结；《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标志着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和现代国家干预主义的开端，故将它们同时首批推出。其他名著将陆续问世。

晏智杰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04年11月15日

中译者序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使我开始着手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翻译工作。未曾经意之间，却渐渐醒悟到这实在是命运交付与我的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首先，我从事经济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多年，虽讲授过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管理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多门课程，但是却对福利经济学所知甚少。毋庸置疑，进行翻译的过程就是我在专业领域中继续深入学习的过程。庇古（A. C. Pigou, 1877 ~ 1959），英格兰人，毕业于剑桥大学，1908 年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至 1943 年，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1918 年曾任英国通货与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1927 年被评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庇古先生在《福利经济学》第一编第 1 章 § 7 中指出：“人类既将‘自己作为活着的目的’，也将自己作为生产的工具。一方面，人被自然与艺术之美所吸引，其品格单纯忠诚，性情得到控制，同情心获得开发，人类自身即成为世界伦理价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感受与思想的方式实际上构成了福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人可以进行复杂的工业操作，搜求艰难的证据或者改进实际活动的某些方面，成为一种非常适合生产可以提供福利的事物的工具。人类为之做出直接贡献的前一种福利就是非经济福利，而为之做出间接贡献的后一种福利就是经济福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可以自主地对这两种人作出选择，并且因此集中力量开发包含于第二种的经济福利，同时却在无意间牺牲了包含于第一种的非经济福利。”这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了福利的深刻

2 福利经济学

含义，它代表着人类的某种满意感，除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所谈到的由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所组成的可以运用货币加以量度的经济福利之外，还包括由人的意识形态、信仰和道德等等所组成的无法运用货币予以量度的非经济福利。也使我理解了先哲们为什么在物质极度匮乏而人均寿命又相对短暂的人生中，能够创造出如此璀璨的文明；而在物质极为丰富而人均寿命明显增加的今天，人们却反而会有信仰的危机或者道德沦丧。这部八十七年前问世的著作，深入分析了我们今天或者正在面对，或者已经认识，或者尚未认识的问题，它对于我们个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恕我不能轻率地予以述评。

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之博大，涉猎之广泛，思维之缜密，逻辑性之强，语言之优美，实为罕见。翻译工作开始后不久，我就意识到自己将接受一次严重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英语和汉语，而且也来自于经济学、金融学、哲学、数学、文学、法学，甚至来自于历史学、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等等。是否透彻地把握了作者的思想，是否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精神，是否准确地表述了作者的语言，是否完美地展示了作者的文采等问题犹如梦魇般地困扰着我，使我夜不能寐，食不甘味。通常我会在凌晨三点左右醒来，翻译两三个小时后再倒头睡去，如果没有其他必须完成的教学任务，我终日会在半醒半睡之间干到午夜。有时会面对一段文字因百思不得其解而枯坐数小时，有时又会多次在睡梦中因反复推敲同一段译文而辗转反侧。有人奉劝我，不要翻译，这实在是得不偿失，要自己写，哪怕借用作者的某些闪光点，演绎成自己的文字……。但是这些均不符合我的性格。翻译工作一经开始，我似乎就无法完全控制自己，既不能半途而废，也不能放缓脚步，更不能一改初衷。一种近乎使命感的亢奋的情绪一直陪伴着我，直到完成全部译稿。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切身经历其中实在是无法深刻体验。当然，我并不认为完成一部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就是天降于斯人之大任，但是也不能苟同对于翻译工作的任何轻视。正是由于有了较好的译文，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因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正是由于缺少较好的译文，才使中国人很少了解庇古先生的《福利经济学》，尽管它也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逐字逐句地翻译庇古先生的鸿篇巨著的时候，我身不由己地被他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似乎也非常具有宿命的色彩。庇古先生十分博学、机敏，充满智慧和幽默，也有些固执，但是使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撼的却是他那悲天悯人的宽大胸怀。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但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却在日益加大。对此，有人认为这恰好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甚至反映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性格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应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甚至推波助澜并分得一杯羹。但是庇古先生却与此大相径庭，他恰恰是站在弱势群体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福利问题的，他在第一编第1章§1就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希望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虽非必须直接或立即，但在一定的时刻并以一定的方式，会对社会的进步带来实际结果的话，则进行相关研究的多数学者均会认为，他们投入时间进行研究实在是一种浪费。这一点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不过对于经济学更是如此。因为经济学是‘对于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所进行的一种研究’，而并非在日常商业生活中的人类最有情趣或最有灵性。在知识的果实以外寻求有关人的知识的人们，将会求之于宗教狂热、殉道或爱情的历史，而不会求之于市场。当我们决定关注人类日常动机的表现的时候——这些动机有时是卑微的、沉闷的且并不体面的——我们的冲动并不是哲学家的冲动，不是为知识本身求取知识，而是生理学家的冲动，是为知识有助于治疗而求取知识。卡莱尔（Carlyle）宣称好奇是哲学的起点，但并非是好奇，而是对于陋巷的污秽以及衰弱生命的苦痛进行反抗的社会热忱，才是经济科学的起点。在此，如果不是在其他领域，科姆特（Comte）的伟大的论断仍然成立：‘以心灵提出我们的问题，用智慧去解决它们。……智慧最为适合的唯一位置，是做社会同情心的仆人’。”

记得一位西方的现代的管理思想家这样告诫人们：如果你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你就最好改变自己。而一位东方的古代圣人则这样回答他的弟子所提出的什么是耻辱的问题：国家政治清明，你出外做官拿俸禄；国家政治昏暗，你出外做官拿俸禄，这就叫耻辱。前者教人应变，后者教人规避。庇古先生则教人参与。他在《福利经济学》第

三版的前言中郑重写道：“我愿意对每一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再进一言，他们很可能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们投入研究的努力过于艰辛而感到气馁。经济学家全力以赴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并不是一项体育运动，而是一种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悲惨与不幸，某些富有家庭的肮脏的奢侈，笼罩着众多贫困家庭的可怕的不确定性——这些罪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以至于令人无法漠视。运用我们进行科学探索所获得的知识，就有可能对它们加以阻止。冲破黑暗的光芒，寻求它就是任务，发现它可能就是奖赏，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对那些正视它的信条的人们的恩赐。”

每当我品味这些文字的时候，都禁不住心潮震荡，热泪盈眶。庇古先生虽然身为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终身教授，但是却有着异常真挚的穷人情怀，他终生致力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愿意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把这部著作郑重地介绍给广大读者，并祈求没有损害原著的光彩。

我的学生毕建凯和孙立新在上卷译稿文字输入和下卷翻译形成初稿等工作中给我以极大帮助，曲伟、汪振洋、崔佳、王青芳、李敏等也做了许多协助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正是在他（她）们的协助下，我才能“连滚带爬”地将这部译著呈现在读者面前。此外，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陆民仁先生的中文译稿，前人的工作对于后人总是大有裨益的。我由衷地感谢命运交付于我这样的任务。

金 镐

2007年2月20日于大连

第三版前言（1928 年）

在修订第三版的过程中，我改正了一些小错误，并且我希望在分析和陈述方面也作出某些改进。同时，在目前可能的条件下，我努力引用最新的案例和法律。在本书结构方面的主要变动如下：删除用于第四编第 8 章的部分内容以及附录“对暴利征税”，因为我们将在《公共财政研究》中讨论这些问题。以下各章是新增加的：第一编的第 4 章，第二编的第 8 章，第三编的第 16 章，第四编的第 7 章。第二编的第 11 章采用原第 10 章的标题，内容全部重写。涉及该章论题的附录三的前五部分也是新增加的。在这些部分中我广泛使用了刊登于 1928 年 6 月《经济期刊》上的文章《供给分析》中的内容；同时，在第四编新加的第 7 章中我也使用了刊登在 1927 年 9 月同一杂志上的文章《工资政策与失业》中的部分内容。

比较详尽地展示于解析目录中的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编论证了，当然是在众多的条件限制之下，（1）国民收入的量越大，以及（2）穷人所获得的收入的绝对份额越大，则规模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福利很可能就越大；第二编致力于研究影响国民收入大小的主要因素的基本类型；第三编研究特别与劳工相联系的影响因素；第四编提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使穷人所获得的收入的绝对份额增大的因素，有可能同时使收入的总量减小的问题，并且探讨当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发生时，对于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影响。在第一版中所包含的分别讨论国民收入的可变性与公共财政的两部分，像第二版一样，在本版中也予以删除。现在在我们的《产业波动》与《公共财政研究》中更全面地论述了与它们相关的问题。

通过尽可能地限制使用专业术语，通过将特别抽象的讨论划归附

录，通过在解析目录中汇总论述的主体框架，我将竭尽全力呈现给读者这部我必须说是具有可能的最小难度的作品。但是，声称这部书并不艰涩是毫无意义的。毋庸置疑，这种艰涩部分地产生于陈述的缺陷。不过，也部分地取决于所研究的问题的本质。人们有时认为无须作特殊的准备，就可以对经济问题加以判断。对物理学和化学无知的“凡人”，仍然可以进入经济学知识的初级殿堂。但是在现实中，这一课题非常艰深，不加掩饰就无法使之哪怕看起来较为简单。

出版这部涉猎如此广泛的著作，使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特殊的难题：国内外在立法和其他方面的变化是如此之多而且迅速，以至于我所涉及到的法律条款和基本条件现在还是确定的，但是当书抵达读者手中的时候，它们已遭废弃。然而，我并不认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不可能完全掌握最新的材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我所使用的案例并非以其自身为目的而提出。我要求它们所提供的服务是有助于对于基本原理的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既可以引用一两年之前已经黯然终止的政策和事例，也可以引用目前仍然活力四射的政策和事例。

我愿意对每一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再进一言，他们很可能因为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要求他们投入研究的努力过于艰辛而感到气馁。经济学家全力以赴所进行的复杂的分析并不是一项体育运动，它们是改善人类生活的工具。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悲惨与不幸，某些富有家庭的肮脏的奢侈，笼罩着众多贫困家庭的可怕的不确定性——这些罪恶是如此地触目惊心，以至于令人无法漠视。运用我们进行科学探索所获得的知识，就有可能对它们加以阻止。冲破黑暗的光芒，寻求它就是任务，发现它可能就是奖赏，这正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沉闷的科学对那些正视它的信条的人们的恩赐。

庇古

剑桥皇家学院

1928年11月

第四版说明（1932 年）

本版的主要变动涉及第一编第 4 章与第 6 章的 § 12 和 § 13；第二编第 11 章的 § 2 与第 15 章；以及第三编第 9 章的 § 2 和 § 3 与第 14 章的 § 1。

重印说明（1952 年）

本书最后一次修订的版本出版于 1932 年，之后重新印刷多次。既然还存在着对于本书的需求，我自然应该愿意对它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以便将近期的著作与我所参考的事件和法律发生的变化都考虑进去。但是，除去印刷已经制成铅版这一事实之外，还因为我现在已经无法集中巨大的精力投身于这一工作中了。与其进行拙劣的修补，不如保持本书主体的原貌。然而，有若干问题我希望对我已经发表的内容进行勘校与扩展，并且参考近期的某些研究成果。为此我增加了新的附录（序号为附录四至附录十一），大部分是重新写的或者以我所写的以及与本书内容相关的其他人的文章为基础。但是在附录八与附录九中例外，我并没有利用《静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没有增加任何有关货币分析的内容，以及与凯恩斯一般理论相联系的观点。主要是这些均与某一领域相关——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于我的《就业与均衡》一书中——但却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最近有关效用的激烈争论，以及“新福利经济学”当然是与本书相关的，但是我感到还没有能力在技术层面上对它们加以讨论，只是以“凡人”的方式在附录十一中提及。

庇古

1951 年 9 月

目 录

第一编 福利与国民收入

- 第1章 福利与福利经济** §1. 经济研究的主要动机是帮助社会进步
§§2~3. 因此, 经济科学是“现实”的, 不是“纯理”的; 但
绝非只是“描述性”的 §4. 对其进行定量分析非常困难 §5.
可以将福利中能够运用货币加以量度的部分粗略地定义为经济福
利 §§6~9. 经济因素以一种方式影响经济福利, 却以另一种方
式影响总福利的事例不胜枚举 §10. 无论如何, 某一关于定量
性结论的假设认定, 影响经济福利的有效因素也将对总福利产生
影响 §11. 同时, 经济科学尽管具有片面和有限的特点, 但却
能够对经济福利的有关影响给出合理充分的结论 3
- 第2章 欲望与满意感** §1. 满意感与货币量度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
的, 而是以欲望为媒介的, 其强度并不需要总是承载它们的实现
所产生的满意感的相同比例 §2. 对于绝大部分来说, 这种情况
并不重要 §3. 但是对于在当前还是在遥远的未来使用资源之间
进行选择来说, 它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4~5. 将个人终将死亡
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看可知, 很可能人们储蓄得较少但同时又以比
符合一般利益更快的速度消耗自然界可耗尽的资源储备 §6. 因
此, 存在着反对对储蓄实行差别征税的假定 §7. 同时支持政府
保存自然资源的行动 19
- 第3章 国民收入** §1. 对于绝大部分来说, 经济因素并非直接地而
是通过国民收入作用于经济福利 §§2~3. 尽管充满矛盾, 采用

2 福利经济学

只包括用货币收入购买的物品，以及个人居住在自己所拥有的房子中所获得的服务这种做法仍然是最为方便的 §§4~7. 国民收入与国民可消费收入是不同的，而且各种问题都与所考察的收入
的定义和评估相联系 25

第4章 维持资本完整无损的含义 §§1~7. 研究与这个问题相联系
的各种困难 34

第5章 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1~4. 如果可行的话，我们应该希望运用实物关系而不涉及人们的偏好去定义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5~8. 但是，这是不可行的，并且我们被迫采用的定义具有一系列的缺陷 39

第6章 国民收入大小变化的量度 §§1~3. 只有价格和数量是我们可获得的数据，在此条件的限制之下，我们需要构建对于国民收入大小变化的一种量度，使之尽可能符合我们对于这些变化所下的定义 §4. 这包括三件事：一设计一种量度，如果掌握了对于所有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数据，那么即可加以应用；二为根据实际可用的有限的数据所作的量度，设计一种可操作的近似值；三确定这一可操作的近似值大概的可靠程度 §§5~14. 讨论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 §§15~21. 然后第二个问题 §22. 最后第三个问题 43

第7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大小的变化 §§1~4. 如果归于穷人的收入没有减少，则在并未迫使人们违背心愿地工作过多的情况下，增加社会的国民收入总量将增加经济福利 64

第8章 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变化 §§1~2. 可以以若干种方式实现有利于穷人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变化，最重要的是要将购买能力从富人那里转移给穷人 §§3~4. 非常特殊的情况除外，这种转移必然增加经济福利 §§5~6. 尤其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像英国一样的国家更是如此 §7. 然而，说到分配不公平程度的降低必然增加经济福利时，情况就相当不同了 68

第9章 对于人口数量产生的反作用	§1. 在第7章和第8章中所讨论的归于任何人群,尤其是归于贫困人群,收入增加的结果,将因人口数量的反应而失效的观点可以予以反驳	§2. 即使排除由较大的财富导致的在意愿和偏好方面的变化,这一命题依然不能成立	§3. 而且,当把它们考虑进去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	§4. 不过,国家之间有关移民的事实使问题复杂化了	§5. 同时,收入的转移显示出困难	76
第10章 国民收入与国民素质	§1. 第7章和第8章所得出的结论现在必须根据当代生物学的知识的启迪重新加以考虑	§2. 这种知识证实了通过限制明显退化的人种进行繁殖的手段很可能增加一般福利和经济福利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附加于,而非妨碍我们的结果	§3. 有时人们认为,当代生物学通过说明与环境比较起来发挥主导作用的遗传因素,已经证明过于关注环境的经济问题是不重要的。提供拒绝接受这种观点的理由	§§4~6. 有时人们进一步认为,在第7章和第8章中宣称的由于(1)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的改进对于经济福利所产生的利益,将由间接的生物学的效应所抵消。提供拒绝接受这种观点的理由		82
第11章 以下的讨论方法						95

第二编 国民收入的大小与资源在不同的用途之间的分配

第1章 导言	§§1~2. 本编的基本问题是探讨在现行的制度下,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在多大程度上使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大量的国民收入最为有利,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完善“自然”趋势的行为是可行的	99
第2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与边际私人净产量的定义	§§1~4. 解释边际净产量这一概念的含义	§5. 区分边际社会和边际私人净产量
	§6. 以及它们各自的价值	102

第3章 边际社会净产量的价值与国民收入的大小 §1. 在不存在移动成本的情况下可以证明，如果只有一种资源配置方案可以使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都相等的话，则该方案将极大化国民收入 §2. 扩展对不同程度的不均等性进行这种分析存在着困难 §3. 在存在移动成本的情况下，最佳配置方案——当然不优于不存在成本的最佳方案——是不同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无法确定的 §4. 在实际生活中很可能有若干个资源配置方案，每一个方案均能使各种用途中的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相等。因此，边际社会净产量价值的均等性并不意味着国民收入极大化 §5. 存在着有益地使用津贴的可能性或余地 106

第4章 收益率与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 §1. 边际私人净产量价值一般地等于收益率 §2. 在不存在移动成本的情况下，利己主义倾向于使各处的收益率相等；存在着的移动成本使它们在成本允许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地相等 §3. 除去就边际私人与边际社会净产量相互背离而言之外，任何妨碍利己主义的自由发挥的事情都能对收入造成损害 111

第5章 消除移动障碍的作用 §§1~5. 一般来说，消除以移动成本或知识缺乏的形式所表现的障碍，使利己主义自由发挥作用很可能提高收益的均等性。但是，这个结论受到条件的限制 §6. 对实际降低成本对经济福利造成的影响，以及只不过将成本从控制资源移动的个人那里转移给国家对经济福利造成的影响二者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 113

第6章 不完备知识对收益均等性所造成的障碍 §§1~5. 由不完备知识对不同用途中的收益均等性趋势所造成的障碍，部分地源于企业账目的特点，部分地源于企业金融的一般结构 §6. 自然地追寻长期而非仅仅短期利益的银行在开创性工作中实施干预，如果其他条件允许，将有助于问题的改善 §7. 以瑞福森人民银行的方式在投资的少数领域所进行的控制，防止了对于借入资源使用上的浪费 117